

●青年史苑

抗战时期的宋庆龄与宋美龄

宋 时 娟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抗战初期,宋庆龄与其胞妹宋美龄,在战时救济工作中互相支持、团结协作。抗战后期,随着国共冲突各自不变的政治立场与姐妹亲情交织在一起,两人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

关键词:宋美龄 宋庆龄 抗战时期 政治立场 亲情

以往对宋庆龄和宋美龄两姐妹的研究成果不少,^①但关于抗战时期两人关系的论述多集中于她们在抗战前期的团结,而对抗战后期两人之间的亲情与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主要原因是材料的缺乏和某些结论的预设。近年来,随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宋庆龄书信的不断公布,展现宋庆龄和宋美龄关系的内容更加丰富。本文试图对整个抗战时期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的亲情、尤其是政治上的合作与分歧进行梳理和归纳。

宋庆龄和宋美龄自小一起长大,小小年纪又同船赴美留学,姐妹情自不待言。成年后她们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且渐行渐远,根本原因当为不同的政治追求和各自既定的政治身份使然。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初确立了联俄容共方针,据说一向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宋美龄却不赞成,对此身

为孙中山夫人的宋庆龄与宋美龄产生过争论,以致姐妹俩好多天互不讲话。^②她俩的政治分歧在那时已初露端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分歧日渐公开化。1926年冬至1927年初,宋美龄随母亲倪珪贞自上海赴武汉与宋庆龄、宋子文相聚。在武汉期间,宋美龄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向其“推销”的共产主义甚为排斥,认为第三国际实际上仍披着帝国主义的外衣,“由于它的伪装,……使我们觉得更加可憎”。^③这进一步彰显出尚未踏上政治舞台的宋美龄,与坚决守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宋庆龄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信仰。

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宋庆龄闻之严厉谴责蒋介石叛变了国民革命。视蒋介石为英雄的宋美龄于7月上旬从上海赶赴武汉,企图劝说宋庆龄改变政治立场。^④8月,为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离开亲人,悄然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远赴苏联。四个月后宋美龄

作者简介 宋时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博馆员。

^①论文集有刘国友等主编《宋庆龄与中国名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文章主要有曹云霞《宋庆龄与宋美龄》,香港《镜报》1981年第4期,[韩]李阳子《宋庆龄与宋美龄》,《宋庆龄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等;关于宋氏家族、宋庆龄或宋美龄的传记著作在此不一一列举。

^②Thomas A. Delo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7, P.56.(托马斯·狄龙《蒋介石夫人和爱玛·米尔斯小姐——中国第一夫人和她的美国朋友》,迈克法兰德有限公司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③蒋宋美龄《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中英文),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印行,1976年版,第32页。宋美龄在书中明确表示,这篇回忆是根据当时所作会谈札记,即在和鲍罗廷每次会谈之后,“做了些提要式的注释,有些日子的会谈摘要比较详尽,有时则由于事忙而较为简略”,综合归纳而成。

^④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成为宋庆龄称之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国民党右派独裁者——蒋介石的妻子。如果说婚前宋美龄仅仅与宋庆龄的政治信仰不同,而嫁给蒋介石则标志着宋美龄在政治立场上与宋庆龄分道扬镳了。

婚后的宋美龄,以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独立个性,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国情感参与政治,表示“和丈夫一起,为实现中国的富强而不懈工作”。^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进而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政治、军事和外交舞台上。就忠于各自丈夫的事业的角度看,宋美龄与宋庆龄颇为相似。面对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而又极力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姐姐,宋美龄站在蒋介石一边,几次受命于蒋,邀请宋庆龄回到国民党政权体系中来,但都被宋庆龄拒绝。由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夫人的崇高政治地位,再加上宋美龄仍对宋庆龄怀有姐妹亲情,即使宋庆龄公开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蒋介石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宋庆龄和宋美龄共同参与的公开活动^②很少。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她们才走到了一起。

一、抗战初期一致抗敌、宣传并支援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长达八年艰苦抗战的序幕,也激发了宋庆龄和宋美龄强烈的爱国情怀,她们纷纷对英美等国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表达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即在上海展开抗敌救援工作。抗战开始,她又积极对外宣传,表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主张团结抗战和实行民主政治;而宋美龄则把她在抗日前线的所见所感通过广播、谈话、文章、书信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传播出去。身为

蒋介石夫人,1938年初她曾对美国记者表示:“我相信目前我对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去为大元帅奉献我的一切。我能分掉哪怕一点点他肩负的重担,都将使中国大受裨益。一夜之间,中国被迫面对创造一个战争机器的重任去和日本人打一场战役,为此日本人花费了三十年时间和巨额金钱。大元帅承受了超出常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我觉得必须尽我所能去帮助他顶住压力,因为目前他对中国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③在此,宋美龄充分表达了她在抗战时期所肩负的使命和支持蒋介石的根本政治立场。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呼声日趋高涨,国共两党加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步伐。主张全国一致团结抗日的宋庆龄首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呼应。1937年8月1日,南京成立了以宋美龄为主席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宋美龄在会上发表讲话,希望妇女团结一致,帮助赢得战争,并要求各地组织分会。宋庆龄及时响应,8月4日,与何香凝将7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设在南京的总会。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闻此消息,宋庆龄“异常兴奋”,“感动得几乎要下泪”,认为“是实现孙总理弥留时和平奋斗救中国重要遗嘱的开始”。^④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宋美龄跟随蒋介石一直坚持在抗日的前线,直到南京沦陷前几天才撤离去武汉。蒋介石带领高级将领亲自到前线督战,宋美龄也时常到前线慰问将士。宋庆龄则在1937年12月底离开上海抵达香港,次年6月14日,在二弟宋子良寓所成立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她自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大弟宋子文任会长。

为拯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大批难童,中国战

①Tyson Li, Laura,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6, P.82. ([美]李台珊:《蒋介石夫人——中国永远的第一夫人》,纽约:格罗夫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②如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1931年12月宋美龄陪同宋庆龄探望国民革命遗族学校的孩子。

③“Duty to Husband, Says Mme Chiang,”*New York Times*, March 27, 1938, quotes from Thomas A. Delo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P.114.《蒋夫人谈对丈夫之义务》,《纽约时报》1938年3月27日。转引自[美]托马斯·狄龙:《蒋介石夫人和爱玛·米尔斯小姐——中国第一夫人和她的美国朋友》,第114页。)

④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596-597页。

时儿童保育会在国共两党人士邓颖超、李德全、沈钧儒等人的倡议下,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宋美龄出席成立大会并致开幕词,被推选为理事长,而在香港的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5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同时组建香港第一、第二保育院,收容从广州等地送来的难童。

作为国民政府战时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宋美龄于1938年7月在庐山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自任指导长,宋庆龄被选为36名委员之一。^①1938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底宋美龄与蒋介石抵达重庆,“妇指会”总部也随之迁到重庆。“妇指会”作为全国各妇女团体的统一组织,对战时孤儿和受伤的民众进行援助、慰劳前线官兵、训练妇女干部等等,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庆龄没有直接参加该会活动,但她后来称赞:“这个委员会发展得很迅速,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派的妇女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讨论。”^②

抗战初期,宋庆龄与宋美龄虽身处不同地方,但没有阻碍她们团结一致抗日的步伐。除战时妇女儿童工作,她们还一同参加了旨在“寓救济于生产、使中国工业走上自救之路”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1937年4月,工合由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上海发起成立,得到了宋庆龄的赞同和支持。次年8月,工合总会在武汉宣告成立,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担任理事长。总会成立不久,中国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1939年1月,宋庆龄在香港倡议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任委员会名誉主席。^③后来,保盟进行了大量支持工合募集款项和救济物资的工作,对此宋美龄有过肯定和称赞。

抗战的前三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宋庆龄和宋美龄在战时妇女工作、难童救济和工合运动等方面可谓遥相呼应,配合默契。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她们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

二、1940年聚首香港和重庆,携手抗日

1940年2月,宋美龄自重庆飞抵香港。^④3月8日,宋美龄与在港的两位姐姐宋庆龄、宋蔼龄一起出席香港各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茶话会。3月28日,宋美龄召集香港各界爱国团体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在香港开展“伤兵之友”运动。“伤病之友”运动1938年由民间爱国人士倡议发起,后归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指导总会统一指导,并成立“伤兵之友”总社,宋美龄担任总社长。宋美龄赴港以前,力促在重庆开展的征求十万伤兵之友的运动。在此次香港联席会议上,宋美龄对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社,为救助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赞扬”,并希望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支持在香港开展伤病之友运动。不久,“伤兵之友”香港总社成立,宋蔼龄担任总会会长;作为发起成员之一的保盟,被要求担任香港“伤兵之友”运动所有账目的审计。“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⑤4月,宋庆龄在重庆被聘为“伤兵之友”总社的理事。^⑥5月15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6期登载宋美龄专为该刊撰写的《“伤兵之友”运动》,以及《“伤兵之友”运动在香港——蒋夫人盛赞孙夫人》的报道。^⑦

宋美龄对宋庆龄在香港开展救济工作的充分肯定、对保盟的认可和信赖,以及宋庆龄对“伤兵之友”运动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是姐妹俩在整个抗战时期政治上最融合的表现之一。另外一个表现,当

①③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621、642页。

②宋庆龄《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④宋氏族姐妹在香港和重庆的情况,广为流传的The Soong Sisters, Emily Hahn,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41,中文译本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新华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的作者项美丽,在抗战初期对宋蔼龄和宋美龄进行过面对面的采访,尤其是1940年跟随三姐妹从香港到重庆随访问视察过,本书对宋氏三姐妹在香港和重庆的聚首有详细的记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三姐妹的团聚“在后人的记述中常常被写得过分私人化和情绪化了,……但此事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该书第364、365页)

⑤⑦吴景平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155、152—155页。

⑥重庆《大公报》1940年4月21日。

为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公开聚首和联袂视察。

1940年3月31日,在宋美龄的邀请和宋蔼龄的要求下,宋庆龄和两姐妹自香港同机飞抵重庆。在重庆的四十天时间里,三姐妹一同视察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看望难童、参观工业合作社、慰问“伤兵之友”医院伤兵等等。在视察过程中,宋庆龄遵循她一贯的原则和立场,号召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进行抗日救国。对宋美龄来说,两位姐姐尤其是宋庆龄来到重庆,于公于私都甚感愉快,她在公开场合曾几次对宋庆龄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给予赞扬。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宋美龄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孙夫人在港领导一般救亡工作甚力,如中国救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及赈灾会等,渠均予以协助。”^①

4月7日,在重庆各界妇女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的大会上,宋美龄在致辞中表示:“抗战以后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为伤兵和难民也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她们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今天,就在这里要求两位姊姊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宋庆龄也在会上发表讲话,“希望全国姐妹们更加努力,要多注重妇女的教育工作,不要做表面文章,要做实际工作”。^②

三姐妹的聚首和视察活动,在重庆引起了巨大轰动,各大媒体竞相跟踪报道。《大公报》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称赞宋庆龄的精神是反侵略的、不妥协的,并提到:“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③但宋庆龄从一开始就是“允许了而造成一个真实的家庭团圆”^④才答应来重庆视察的。在重庆,宋庆龄向好友王安娜坦率表示:“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我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这里那样,当展品。”^⑤

5月9日晚,按照事先约定,宋蔼龄陪同宋庆龄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对这次视察,宋庆龄公开表示非常满意:“(一)人民对抗战信念极坚,内地生产建

设与日俱增,散漫人力业已团结,抗战必胜;(二)政治已大见改善;(三)各方均深明抗战大义,情绪团结,敌伪造谣徒见其心劳日拙。”^⑥三姐妹在重庆的聚首和视察活动,无论当事人怎么想,的确是一次团结抗战的重要举措和表现。

返回香港后,宋庆龄继续保盟的救济援助工作。她向外国救援团体公开表示保盟“首先援助那些不能从一般救济工作、红十字会及援助中国组织得益的所有前线及游击区”。当时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刻。1940年底,汪精卫在南京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摩擦日渐增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重大危机。在此大背景下,保盟对游击区的救济工作乃至整个处境都受到影响。例如1940年,保盟委托英国救济物资运输机构工作的有关人员将美、英两国捐助的8吨药品运送延安,中途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扣留。^⑦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1月18日宋庆龄和何香凝、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为”。3月上旬美国政府亦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抗日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但5月初宋子文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宣布退出保盟。

国共冲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对宋美龄与宋庆龄关系的影响,并不像宋子文退出保盟那样直接和明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不得不退居重庆,再次相聚的姐妹俩有了更多话家常的机会,但抗战前期的合作局面不复存在。

三、抗战后期的姐妹亲情

1941年11月27日,身在美国华盛顿的宋子文致电宋美龄:“太平洋局势严重,一触即发,请设法使二姐速离香港。”^⑧宋美龄转达此意后,宋庆龄并没有打算离港。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住在九龙的宋庆龄遭遇了日军的空袭。当天,宋子文急电宋美龄:“港危。可黑夜派机设法

①③重庆《大公报》1940年4月2日。

②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8日。

④项美丽著,仓圣译《我与中国》(China to Me),上海复兴出版社1945年版,第36页。

⑤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83页。王安娜,德国人,时为“保盟”工作人员。

⑥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5月21日。

⑦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686—689页。

⑧张俊义《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载《百年潮》2004年第12期。

使二姊出险否?盼复。”^①12月8日晚上,宋庆龄在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钟秉铎的帮助下,趁灯火管制期间从九龙逃至港岛。^②12月10日凌晨5点,宋庆龄和宋蔼龄才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前往重庆。当天宋子文自华盛顿电告宋美龄:“姐姐们已安全抵达,放心。”^③抵达重庆一个月后,宋庆龄致函宋子文,讲述自己的脱险经历,并提到“若不是蔼龄姐碰巧在香港,我还会这么快的脱险”^④。宋庆龄和宋蔼龄所乘飞机是否为宋美龄所派出,宋庆龄信中没有说明,但香港脱险一事充分体现了危难时刻宋氏兄弟姐妹互为关怀的手足之情。

宋庆龄到重庆后,因一时找不到房子暂居宋蔼龄的寓所“范庄”,后宋美龄也为宋庆龄找过住所。宋庆龄历经香港脱险,精神极度紧张,以致几天之后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姐妹们对她的照顾无疑是莫大的安慰。“姐妹们对我很好,但你(指宋子文)知道我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靠她们生活我会感到羞耻。”^⑤不久,宋庆龄在宋子文的帮助下,住到了重庆两路口新村三号。由于重庆酷暑难耐,宋庆龄也会到黄山别墅去避暑,这其中肯定得到了宋美龄的帮助。宋美龄对宋庆龄的关心和照顾还表现在给宋庆龄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便于两姐妹通电话聊家常;为了宋庆龄的生命安全,特意打电话给宋子文,嘱托他警告戴笠“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⑥她还不时送鞋子和衣服等生活用品给宋庆龄。

宋庆龄自然非常珍惜这份亲情。从目前已经公布的宋庆龄书信可见,宋庆龄在致友人书信中,宋氏家族成员里面提及最多的就是宋美龄,且集中在

抗战后期,或称“美龄”,或称“蒋夫人”,内容涉及到宋美龄的活动信息和对宋美龄的一些看法。在书信中,宋庆龄充分肯定了包括宋美龄在内的“我的家族”为抗战所做的贡献^⑦。1942年11月,宋美龄为治病和寻求美援赴美,临行前宋庆龄以家人的身份去机场送行^⑧;1943年7月,宋美龄自美国飞抵重庆的当天,宋庆龄又去寓所看望她^⑨。就宋美龄访美事宜,宋庆龄在书信中是这样记述的:“也许你听说蒋夫人又与拉铁摩尔博士^⑩一起抵达华盛顿,我怀疑她的健康能否适应那儿的紧张活动。如果有希望得到更多的轰炸机和弹药装备,使我们能有效地抵抗敌国,她的美国之行将使中国大大受益。”^⑪“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在集会上对倾慕她的人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⑫宋庆龄的言行,既饱含着姐妹亲情,又有政治上团结一致表示。

但抗战后期宋美龄对宋庆龄的政治态度已发生变化。1943年6月26日,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代表三姐妹接受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说。在演说中,宋美龄对宋庆龄是如此评介的:“孙夫人以国府委员之地位,曾激励并维持中国军民继续抗战之士气,以薪俸给若干妇女,鼓励彼等训练学生为中国全国之其他妇女工作。彼对于出征军人之子女,亦极为注意,此等出征军人不仅为中国而战,且为同盟国之共同目标而战。”^⑬此语表明宋庆龄俨然是国民党妇女领袖,这是抗战后期宋美龄对宋庆龄少有的评价,也正是宋美龄所希望的,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抗战后期,表

①宋子文致蒋夫人电(1941年12月8日)影印件,引自《宋子文与他的时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②④⑤张俊义《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载《百年潮》2004年第12期。

③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宋子文档案,第64盒,文件夹1。

⑥《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226页。

⑦1942年10月5日,宋庆龄在给美国好友阿莉(Alexandra Mann Sleep)信中说:“你也许知道我们三姐妹都在这个城市里,各自为反法西斯战争而斗争。……我的两个姐妹比我更忙,她们有许多社会工作和官方职务。……我的三个弟弟现在在华盛顿,他们为我们输送抗战物资。这样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宋庆龄书信集》(上),第214页。

⑧[美]约瑟夫·史迪威著,莫加林、张红叶、陈宇、米小平译《史迪威日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⑨蒋介石日记(1943年7月5日),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

⑩即Owen Lattimore,美国人,曾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

⑪原件藏于北京宋庆龄故居,转引自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745页。

⑫《宋庆龄书信集》(上),第237—238页。

⑬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6月27日。

面上的政治团结已掩盖不了姐妹二人的政治分歧,此时宋美龄已很少公开赞扬宋庆龄的救济工作,而宋庆龄对以宋美龄为核心的家族政治也颇有微词。

四、抗战后期的政治分歧

宋庆龄抵达重庆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使保盟与海外援助机构重新建立起了联系。但保盟在重庆没有在香港那么自由和方便:一是没有办事处,很多救济工作都要在宋庆龄家里开展;二是坚持“真实报道传统”的《新闻通讯》未能发行,而且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干扰,不仅要向重庆市社会局登记,还要报告款项的来源、分配的去向和用途。在救助难童的捐款问题上,甚至引起了宋美龄的不满和抱怨。

1942年4月,宋美龄向宋庆龄索要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ci)500元的捐款。宋美龄认为,既然美国援华会的募捐口号是“为了中国的难童”,捐款就应该给她。对此,宋庆龄做了妥协的处理。^①1942年8月,宋庆龄在致友人函中提到:“在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听到蒋夫人抱怨说,美国援华会利用战争孤儿的宣传捐钱,但不是为了她的协会,而是为了保卫中国同盟。我当时正好在另一张桌子上,因此未能进行驳斥。她是向马休上校说这番埋怨话的。她还提到必须告诉爱德华兹多给她一些资金。”^②

长久以来,宋美龄非常关注儿童发展,婚前曾受聘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工童工委员会”委员^③,婚后在南京中山陵创办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抗战期间对孤儿的救助,宋美龄更是倾注了很多心血。她以“妇指会”为平台,向海外广为宣传,争取捐助。她还领导国民党的高官夫人,积极组织国内的捐助活动。至1940年,“妇指会”下设的“儿童保育组”已收容前线孤儿25000人。所以,对美国援华会捐款事件,宋庆龄认为:“很明显,这是个很久很久

的宿怨,她一直反对我们‘干预’难童工作,那是她的领域!”^④既然都是为了难童,宋美龄缘何不能接受宋庆龄的“干预”呢?据王安娜回忆,宋庆龄为筹款举办慈善舞会时,重庆的名流夫人积极响应,但是“她们的丈夫为此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怕这样会引起蒋介石夫人的不满。蒋夫人也正在为她任会长的福利机构筹款。这位第一夫人对她的姐姐大受公众欢迎很不高兴。”^⑤这或许是一种解释。从实际情况来看,抗战后期宋美龄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救济活动上,的确很少见到宋庆龄的身影。

宋庆龄并没有因为宋美龄的“不高兴”而停止难童工作,尤其是对中共领导下的游击区难童的救助。1942年下半年,宋庆龄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其他人士捐献的钱物,资助原本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的延安中央托儿所,创建洛杉矶托儿所。^⑥11月下旬,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撰文,呼吁救济中国战时难童,支持宋美龄和宋庆龄的工作,并特别提到西北游击区的儿童^⑦,这也从侧面说明内部的政治分歧不该影响到对所有中国难童的救助上。

摩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宋美龄和宋庆龄抗战救济思想的差异。从抗战开始,宋美龄主张全国所有的妇女团体救援组织都要统一到她所领导的妇女组织中,听从国民党政权的统一安排;而宋庆龄主张哪里需要就救助哪里,在国统区依然保持着保盟的独立性,并且把部分救援款项和物资给了中共。这显然与宋美龄以国民党政治统治需要为中心的考量标准不同。

抗战后期,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与抗战前期有了明显不同,这从她们各自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也能看出。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投身于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事务:1942年2月,她随同蒋介石访问印度,争取印度与中国共同抗日;1942年5月,她和蒋介石再赴印度,视察中国军队和战场;1942年11月到1943年7月,她赴美寻求美国援助;1943年11月,又随蒋介石前往开罗参加美、中、英三国首脑会

①《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②《宋庆龄书信集》(上),第211页。

③蒋宋美龄《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第36页。1923年6月,在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推动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童工委员会,进行有关上海童工问题的调查研究。

④宋庆龄致王安娜函(1942年4月30日),《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9页。

⑤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90页。

⑥杜淑贞主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6页。

⑦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9日。

议。而宋庆龄则专事保盟的救济工作,虽然也参加国民政府在重庆的一些公务宴请,甚至在1942年11月12日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①。但团结是表面的,宋庆龄被排除在与宋氏家族密切相关的“国家”要务之外。比如,宋美龄访美期间,宋蔼龄“每天忙于蒋夫人与委员长之间往来电报的译码工作,往往持续十小时”,^②以至于无暇给宋美龄写信;关于宋美龄要去英国访问一事,宋蔼龄又成了驻英大使顾维钧和宋美龄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宋美龄访美回来后,与宋蔼龄一起多次调和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所有这些核心事务,宋庆龄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其中。

抗战后期,尽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能维持,但国民党一直没有停止反共步伐。宋美龄访美归来后,宋庆龄预测“她这次访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委员长决定在美国开展一场反对中共的运动”。^③1944年初,宋庆龄给美国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写过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的材料,此举遭到了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当面指责。2月10日,宋庆龄约见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告之因此而行动受阻的情况,宋庆龄说:“我的家族从不与我谈论政治。”当问及外国人对宋子文失宠的看法,谢伟思表示除了流传的谣言外一无所知,宋庆龄十分失望,声称自己同样两眼一抹黑,因为自己不在家族的圈子中。^④

在香港时,宋庆龄曾私下抱怨:“美龄告诉小弟子安‘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对二姊讲’。”^⑤显然,让宋庆龄“两眼一抹黑”的关键人物正是蒋夫人宋美龄。纵然宋美龄对宋庆龄怀有姐妹之情,但在国民党内政外交上,宋美龄一直都是蒋介石的支持者。1942

年5月,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粤北被国民党绑架入狱。6月,宋庆龄就此事问及宋美龄,“蒋夫人只回答说她一无所知,并说要把此事报告给蒋大元帅”。^⑥结果直到1946年廖承志才获得释放。宋庆龄原以为凭借姐妹情意可以达到说项的目的,岂不知国共政治斗争并非私人感情所能动摇。

1944年7月,宋美龄和大姐宋蔼龄一起赴巴西治疗皮肤病。临行前,她们还送给宋庆龄鞋子一类的生活物品^⑦。宋美龄从巴西到美国后,为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寻求美国的援助。1945年9月5日,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寻求美援无望的宋美龄回到重庆。离美前,她对好友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走,但是我丈夫在未来与共产党的危机中需要我。我希望并祈祷国家能避免军事冲突、实现国家统一。”^⑧同年10月,宋美龄和宋庆龄一同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五、结 语

抗战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矛盾取代政治党派斗争成为主要矛盾,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在此大背景下,宋庆龄和宋美龄以不同的政治身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时期由此成为姐妹俩一生中政治上最融合的时期。从抗战初期的团结协作,到抗战后期政治分歧的凸显,两姐妹之间的关系既反映了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对她们的影响,也表明两者谁也不曾放弃各自的政治立场:一个全心全意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统治,另一个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坚持民主政治和全民族抗战。当然,政治分歧

(下转第51页)

①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3日。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3页。

③《宋庆龄书信集》(上),第237—238页。

④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771-772页。

⑤2004年10月,本文作者访问李云(1937年12月陪同宋庆龄去香港的中共联络员)。又见于李云:《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

⑥《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4页。

⑦1944年8月14日,宋庆龄致函普赖斯小姐(Mildred Price,时为美国援华会的执行秘书,也是中国战灾孤儿和儿童福利美国委员会的执行主任),信中附言:“你好心经Fitch先生给我的鞋子,我刚刚收到。请你以后不用再给我寄鞋子了,因为我赴巴西的姐妹已经给了我几双。”《宋庆龄书信集》(上),第177页。

⑧Thomas A. Delong,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P.191. (美)托马斯·狄龙《蒋介石夫人和爱玛·米尔斯小姐——中国第一夫人和她的美国朋友》,第191页。)

斯曾经说过：“我也喜欢共和国，但却是武装的、光荣的、有序的共和国。”^①巴雷斯所爱的是凯撒独裁的古罗马共和国，而非民主宪政的现代共和国。更有甚者，如莫拉斯，视共和国为敝屣，企图恢复君主专制。共和派固然可以指责莫拉斯不爱国，但人们却很难说莫拉斯不是爱国者，只不过他效忠的对象是他想象中的“法兰西王国”。

耐人寻味的是，正因为对共和政体恨之入骨，莫拉斯等部分右派民族主义者对 1940 年第三共和国灭亡无动于衷，反而成为纳粹德国合作者与维希政权支持者，并且在 1945 年受审时依然坚称自己

从未叛国。二战前后，莫拉斯的顽固态度在法国乃至欧洲各国的右派民族主义者中并不罕见，法国的莫拉斯、英国的莫斯利、挪威的吉斯林，都是以“爱国者”自居的“卖国者”。总体而言，法国抵抗运动与维希傀儡政权的斗争，同样是左右两派民族主义理念的斗争。这种由于理念分歧而产生的阵营对立，在二战结束后的欧洲时隐时现。时至今日，左派政治民族主义与右派文化民族主义的纠纷，依然是欧洲政治生活的常态，而这都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裂变。

^①Antoine Olivesi and André Nouschi: La France de 1848 à 1914, Paris: Nathan, 1997, p.290.

(上接第 67 页)

并没有割断亲情的纽带，她们私底下尚能够维持着互为关怀的手足之情。

种种迹象表明，长期脱离国民党政权的宋庆龄，与同属于国民党阵营的其他兄弟姐妹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她与宋美龄的关系尤为复杂。如果说早期宋庆龄和宋美龄持有不同的政治信仰，那么后来国民党的统治利益以及宋美龄蒋介石夫人的身份，成为影响她们关系的最关键因素。宋庆龄和蒋介石在历经多年公开不和后，抗战时期有过一定程度的缓和，家族的姻亲关系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①。但涉及政治立场，比如中共问题，两人是不可能完全和解的。1945 年 3 月，宋庆龄向蒋介石为中共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争取名额，“此庆龄与我提共匪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②，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宋庆龄的说项当然无效。在党派利益上，作为国民党政权上层代表人物和蒋的支持者，宋美龄亦不会逾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关系，折射出她和国民党政

权之间关系的走势。

因此，考察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关系，既要从小亲情的视角，更要从她们各自的政治身份和政治立场去审视，毕竟她们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过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而且又都不可避免地受当时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的投射和影响。她们的私人情感和政治立场时而交错，姐姐和妹妹、孙夫人和蒋夫人，这种双重的身份和定位常常纠结在一起，决定了她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性，这在抗战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投身到保盟更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参与战后重建的救济工作，仍然坚持通过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反对国共内战。而宋美龄随同蒋介石还都南京，再次成为国民党反共内战政策的强大支持者。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姐妹情谊，阻挡不了日后二人天各一方的分离悲剧，亲情再一次服从于各自的政治追求。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这或许是姐妹俩的共性。

^①1943 年 3 月 12 日，蒋介石和蒋纬国在孙中山纪念日拜访宋庆龄，宋庆龄用酒酿蛋款待了他们，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余谓此故乡宁波宽(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蒋介石日记(1943 年 3 月 12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②蒋介石日记(1943 年 3 月 17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